

第5典

教化与礼仪学术

第6典

第7典

科学技术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文化交流

第1典

沿革

第2典

第3典

地域文化

第4典

民族文化
制度文化

中华文化
通志



第8典

【艺文】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诗词曲志

张伯伟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8 典

【艺文】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诗词曲志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诗词曲志

作者简介

张伯伟,1959年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著有《禅与诗学》、《钟嵘诗品研究》、《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等。

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和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究讨论。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恰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本书所论述的,是以汉语为表现媒介的诗词曲,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影响下产生和变迁的历史。全书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为“诗歌志”,从诗字原始观念的形成、《诗经》和《楚辞》,论述到少数民族诗人和域外汉诗,在最广泛的范围中展示了中国诗学在技巧上、题材上、语言上和审美趣味上的变化;下编为“词曲志”,全面考察了从诗到词、从词到曲的转折,并且比较了诗词曲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的异同,勾勒出词曲历史的发展脉络。最后,综合诗词曲中白话因素的不断增强,指出新诗在整体上取代旧诗地位的历史必然;同时,在描述新诗运动从破坏到建设的过程中,揭示了作为中国诗歌史的一个新阶段,新诗的进一步发展的潜在趋势。

目 录

导 言	1
-----	---

上编 诗 歌 志

第一章 “诗”字原始观念的形成及其流变	7
第一节 “诗”字古义检讨	7
第二节 “诗”的观念从宗教到人文的展开	10
第三节 从“诗”的早期观念看中国诗学的若干特质	16
第二章 温柔敦厚和香草美人——中国诗学的初建	21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诗歌的地域性	21
第二节 “《诗经》学”上诸概念的诠释	25
第三节 《楚辞》的兴起	43
第三章 秦汉大一统制度下的诗歌	56
第一节 秦汉文化政策及其对诗歌的影响	56
第二节 乐府诗的消长	61
第三节 文人五言诗的形成与成熟	72

第四章 士人之诗与贵游之诗	79
第一节 “五言腾踊”的建安诗坛	80
第二节 士人之诗的系列及特征	87
第三节 贵游之诗的系列及特征	102
第五章 唐诗的发展	125
第一节 南北文风的交融和唐诗面貌的形成	127
第二节 盛唐气象	136
第三节 唐诗的新变局	152
第六章 宋诗的特征及其形成	168
第一节 宋诗产生的文化背景	169
第二节 宋诗的发展及其特征的形成	174
第七章 少数民族诗人的崛起	194
第一节 辽朝	196
第二节 金源	201
第三节 元代	207
第四节 清代	214
第八章 域外汉诗总说	221
第一节 朝鲜汉诗	222
第二节 日本汉诗	234

下编 词 曲 志

第九章 词体的形成 ·····	261
第一节 词体的起源——音乐与文学·····	261
第二节 词体的形成——从《云谣集》到《花间集》·····	264
第三节 诗词异同——兼论词体的特征·····	269
第十章 两宋词的发展 ·····	279
第一节 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	279
第二节 慢词的创新与词境的升华·····	284
第三节 格律词和豪放词的发展·····	291
第十一章 清代词学的“中兴” ·····	312
第一节 清初词坛·····	312
第二节 清词流派·····	319
第十二章 散曲的形成与特色 ·····	335
第一节 散曲的渊源与形成·····	335
第二节 散曲的特征·····	341
第十三章 散曲的发展 ·····	349
第一节 元散曲·····	349
第二节 明散曲·····	363
第十四章 从旧诗到新诗 ·····	374
第一节 传统诗词曲中白话因素的演变·····	375

第二节 新诗的发展·····	383
参考文献·····	395

导 言

本书所论述的，是以汉语为表现媒介的诗词曲，在中国文化精神的影响下产生和变迁的历史。

“歌”有徒歌和入乐之分，徒歌亦称为“谣”。《诗经·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从文体的意义上说，歌谣是接近于诗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孔子删诗，杂取周时民俗歌谣之辞，以为十五国风，则是古之有诗，皆起于此，故又通谓之诗。”所以歌、谣、讴、诵、辞、谚，皆可通之于诗；前人论述诗体的起源，也往往上溯于歌谣。本书以“诗歌志”为上编，包括了古今体齐言和杂言诗、乐府及歌谣。词、曲都是先有曲调，然后根据其节拍配上歌词演唱，所以是“由乐以定词”（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的。宋翔凤《乐府余论》说：“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从文字的角度看是词，从音乐的角度看就是曲。前人也往往将词曲并论，如王易的《词曲史》、龙榆生的《词曲概论》等。本书以“词曲志”为下编，其中“曲”只限于散曲，不包括杂剧和传奇。广义地说，这里的诗词曲都可以用“诗”来统摄；因此，本书所论述的对象，也就可以说是中国诗学。

作为《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一种，本书论述的范围、重点以及写作方式有别于一般的诗歌史或词曲史论著。

本书涉及的时间段,从《诗经》时代直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约有两千五百年。作为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之一的文学,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也往往体现出文化的变迁。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文学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在历史上,也出现了大量少数民族的优秀诗人,他们用汉语为表现手段从事创作,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本书列专章讨论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正是着眼于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在更广泛的范围中来看,汉文化不仅对于少数民族,而且对于周边接壤的邻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汉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汉文学,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文学史上也曾经被视为正统文学。域外的许多优秀诗人,也曾用汉语写作了大量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的作品。这些作品,既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又往往带有异域馨香。从文化的传播与变迁的角度看,认识域外的汉诗学,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汉文化,使人们在了解汉文化的主流之外,更能了解各汉文化支流与主流、支流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的特色。正因为如此,本书将域外汉诗也置于讨论的范围之中,以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

精神文化在开创时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种开创意味着文化由原始阶段进入高级阶段,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往往决定于这个时期,所以德国哲学家雅斯柏斯(Karl Jaspers)在其“*The Great Philosophers*”一书中,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这一阶段称作“轴心时代”(Axial Age)。从文化的角度看诗学,则一个民族诗学的特殊性也往往奠基于其初始阶段。由此而导引出本书的两个写作重心:一是注重中国诗学初创期的讨论,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即观念上和技巧上;二是注重中国诗学转型期的讨论,它也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即题材上和审美趣味上。而对于缺乏这种初创和转型意义的部分,如叶燮指出的“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原诗》内篇下),则略言之。

从文学角度认识文化,当然也须注意文学自身的特点。韦勒克(Rene Wellek)与沃伦(Austin Warren)在其所著《文学理论》中,曾引用贝特森(F. W. Bateson)的一段话说:“真正的诗歌史是语言的变化史,诗歌正是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中产生的。而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和文化的各种倾向产生的压力造成的。”(刘象愚等译,第186页)作者同时又加以修正道:“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文学同样也给予语言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同上,第187页)所以,注重诗歌语言的变迁,也就成为本书的另一个重心。语言的变迁包括节奏上的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和自由体,词汇上的古词、新词、方言、口语和白话,句法上的对偶、平行、倒装,以及韵律上的平仄和压韵等。由四言发展至五七言、长短句,由诗而词而曲而新诗,所反映的也是诗歌语言逐渐向接近自然的语言靠拢的趋势。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诗歌历史的国度。在诗教传统的影响下,中国诗人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的敏感性,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相当突出的。现代评论家往往指出我们的文学传统中缺少“纯文学”的观念,太多的作品中含有道德训诫和政治讽谏的意味;即便是表达男女爱情的诗歌,其中也往往寄托着君臣遇合之感。用这样的眼光从整体上来概括中国诗学,难免失之片面,但以上的指陈也的确说明了中国诗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研究视角的不一,许多优秀的有关诗词曲史论的著作,未能充分地展现那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诗学面貌的各种文化因素。这一缺憾,希望能够在本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同时,本书较少对作品进行纯文学的鉴赏和分析,也是由题旨本身所决定的。

总之,想在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中,描述两千五百年诗词曲的复杂而曲折的变迁史,挂一漏万诚为难免,顾此失彼竟是追求。清人王士禛论诗云:“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赵执信:《谈龙录》引)借用其语,透过本书对中国诗学的

“一爪一鳞”的描述，读者或许也能联想到首尾完好的“龙”的全身吧；透过其屈伸变化的过程的勾勒，或许也能感受到其继续腾飞的方向吧。